

★期十六第★

版出日六十月二年二十三國民

讀書通訊

刊月半

目錄

中國思想史綱要 <small>(學術論著)</small>胡適	儒道兩家之政教思想.....汪真基	研究工程學應有之認識 <small>(讀書指導)</small>邵逸周	對於第三次全國美展的感想.....蔣復璁	怎樣復興我們的書學.....祝嘉	公務員的五常 <small>(生活指導)</small>阮毅成	幾種中國外交史的史籍.....文秀瑞	「讀十力語要卷二」.....張德鈞	文化一、國人哲學論著概觀 <small>(紀彬)</small>	記事二、傅樂煥氏關於宋遼金史之雜著 <small>(宗教)</small>
---------------------------------------	-------------------	---	----------------------	------------------	---------------------------------------	--------------------	-------------------	----------------------------------	---------------------------------------

編主

三恭鄧

行發

會書讀社務服化文國中

(號九十三街器設慶重)

學術
論著
〔中〕〔國〕〔思〕〔想〕〔史〕〔綱〕〔要〕

胡適

胡先生此文，載在美國亞細亞月刊（Asia）一九四二年十月號，譯

題爲 Chinese Thought，是胡先生卸任駐美大使後所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恭三兄要我把它譯出登入讀書通訊，以饗國內的讀書界，我對於這個邀請，和對於能有機會翻譯胡先生的文章，均感到十分榮幸，因即亟爲譯出。不久以前，報上曾載有美國華盛頓通訊，說胡先生現正在美從事於中國思想史的撰述，大約這篇文字就是那部新著的前奏了。從目前世界局勢及戰後世界必然出現的局面來看，把中國思想有系統有條理地介紹給西方人士，此刻正是最好的時機。這項巨大的工作，若由西洋人担當是不可設想的；而在中國大中，胡先生可說是唯一適當的人選。所以我極樂意將這篇譯文刊布出來，一方面聊以表示我們對於這位當代大思想家一點區區的敬意與紀念，同時也藉以預告並歡迎一部劃時代的大著的出現。譯文如有粗陋錯誤之處，尙祈讀者加以指正。——譯者識。

爲了方便起見，中國思想的歷史，可以分爲三個主要時期。耶穌紀元前的一千年爲上古時期。偉大的中古佛教及道教時代，以及一直通過了紀元後一千年的全部時間，都爲中古時期。而近世這一時期，則爲中國理智復興期；這一時期，遠從第十世紀大規模的刊印書籍，以及第十一世紀，第十二世紀新孔子學派起來的時代起，一直延長到我們這個時代。每一時期，都佔了將近一千年的光景。

中國思想史的上古時期，可說是古典時代。從那時傳下了一些前於孔子的古典作品，詩歌的，歷史的，關於行爲軌範的，關於宗教崇拜的；此外當然還有許多大哲學家的作品，如老子及孔子，墨家，一直到孟子，莊子，及韓非！——這可稱之爲中國學術的「舊約全書」時代。這個上古時期，不獨爲所有後來各時代的中國思想確立了一個主要的模型，而且也提供了許多靈感和智慧的工具，使中國中古及近世思想家們，可以用來做憑藉，去爲哲學及文化的復興而努力工作。簡單說來，古典中國的理智遺產，共有三個方面：

牠的人文主義，牠的合理主義，以及牠的自由精神。

其所以成爲人文主義的，是爲了牠始終而且明顯地注意人類的的生活，人類的行爲，以及人類的社會。舉例來說，當孔子被人問應當如何事鬼神時，他就說：「未識事人，焉識事鬼？」他又被問關於死的意見時，他就說：「未知生，焉知死？」這種對於人以及人生的執着，就成了一個特點，使中國古代思想與印度、波斯、甚至以色列（Judea）的古代思想，截然不同了。中國古典時期的思想家，主要地是道德哲學家，教育哲學家，社會哲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古代中國曾建立一個偉大的文明，而且又產生了許多關於人性、關於道德行爲、關於法律及政治組織的，種種成熟的學說，但對含有一樂園「意義的「天堂」，看做「末日裁判」地方的一「地獄」，則一無所知，並且對於生死問題，也從來沒有就於玄思默想過。

其次，中國古典思想之所以成爲合理——成爲唯理智主義的原因，是由於牠對於知識、學問、和思想的重視。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當時，中國思想的派別很多，從孔子的明顯的唯理智主義的態度（孔子曾明白承認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一直到老子更明確的、唯理智主義者的（Rationalistic）、但却幾乎是反理智主義者的（Anti-Intellectualistic）態度。老子還吟詠過：

「不出戶，
知天下；
不窺牖，
見天道。」

在這兩極端之間，可以尋到那時中國思想上一些其他的偉大學派。他們的不同之處，是在於對那比較吃力的學習及研究過程的注重程度，各有不同；或在於對那比較危險一點的、專靠直覺推理的注重程度，各有不同。這一類的差別，在兩種不同的性情之間，本是些很自然的差別。這兩種性情，真

康僧德新氏曾經把一個觀念之爲「軟心腸的性情」，把另一個稱之爲「硬心腸的性情」。中國思想從未訴之於超自然的或神祕的事物，以作爲思想或推理的基礎。從這一點看，一般說來，中國思想是始終唯理的。而且，他的所有正統學派，對於知識和考察，都十分重視。再從這一方面看，他確是偏重於唯理主義者的態度。

人文主義者的興趣，與合理及唯理主義者的方法論結合起來，這一結合，就給予古代中國思想以自由的精神。而對於真理的追求，又使中國思想本身得以自由，孔子說：「君子不憂不懼」，又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窮到他自己時，他又說：「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在中國道德與理智影響力最偉大於孔子的孟子，也曾經更有力的表示過這個自由的精神。他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這種人文的，合理的，及自由的精神，就是古典時代對於後代理智生活所傳下來的，最大的遺產。也就是因爲這種精神，所以方能使得那個時代多數的倫理、社會及政治作品，現在讀起來，還是和我們現代的作品一樣。

這裏就是孔子和他自己國家統治者的談話：

魯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說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定公又問：「一言而喪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說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從這樣一個人道的、合理的、客氣的、然而在精神上又是這麼堅決，這麼自由的回答裏，我們最可以了解二十五個世紀以來，孔子對於中國人的控制力量的所自來了。

下面是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問答：

「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孟子問。

「無以異也。」梁惠王答。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王曰：「無以異也。」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下面又是孟子告訴齊宣王的一段話：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從這類的討論中，我們不禁要覺察到人文主義的精神、合理的精神、以及自由政治批評的精神。這種精神，就使孟子成爲人類史上民主政治的最早也許是最大的哲學家。

這個古典時代三重性質的遺產，就成爲中國後來各時代文化與理智生活的基礎。他供給了種子，由那裏就生出了後來的成長與發展。他又盡了肥沃土壤一樣的使命，在那裏面，許多種類外國思想與信仰都種了下去，而且成長、開花、結果了。他給中國以一個理智的標準，可以用來判斷及估計一切外國輸入的理想與制度。而一遇到中國思想變得太迷信、太停滯、或太不人道時，這一個富於創造性的理智遺產，總歸是出來救了他。

雖然當中曾經有過一千年的時光，一般人都集結於迷信傳教，也還並沒有能夠根除這個遺產。曾經有過一個時期，好像中國的合理性及人文主義，已經被一個中古時代思想的洪流所淹沒了。這個中古思想，就是由印度及印度化思想信仰統治下所產生的。成千成萬的男人女人，都出了家去當和尚或尼姑。宗教熱就像浪潮一樣的沖進了中國。作爲對於佛教神聖獻祭的最高形式，一個虔誠的和尚，可以欣然地拋掉一個手指、一條胳膊、或者甚至他的整個身體。上千的侍男信女，有時甚至是在宮庭中的人物，也都蜂湧到山上去，

目而，悲泣一個高僧的自焚。

正是爲了這樣的出於態度，和這樣非人道的狂熱，才又把中國震動得恢復了知覺，恢復了理性，恢復了人性。在歷史上那幾次政府迫害佛教舉動的背後，永遠的有中國文明對於要使中國「極化」的這潮流的一種反抗態度存在着。

舉例來說，公元八個五百年對佛教大迫害時，上層裏的主要意思是說：「中國政府不該把中國人民棄之於對一個外國捨生宗教的崇拜了。」這就是中國人道主義對於使中國思想文明印度化的一個革命。

中國反抗佛教的最大代表，及大聲疾呼得最厲害的領袖，是韓愈。他指出過，中國思想的最高理想，是說一切的個人道德及理智培養，必須有一個社會的目的，而這個目的呢，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所有一切志在由苦行及逃世以自救的個人教育，都是反社會的，因之也是非中國的。

韓愈爲這個反抗提出了著名的箴鋒吶喊，所謂：「人其人！」那就是說，使和尚和尼姑們一律恢復人性和人的生活！他對於佛教的嚴厲的批評，特別是他對於皇家庇護佛教的攻擊，就使他在八一九年遭到了貶斥。然而，在精神上，他却是第十一、第十二世紀中新哲學運動的創造者。這個運動，後來就產生了「唯理哲學」(理學)的復興與形成。

這次現世的及創造性的哲學運動的復興，就爲中國思想的第三或近世時期開了先河。那是中國哲學的一個復興時代。在近世中國哲學前九百年的發源中，古典時代的人文主義，唯理主義以及自由精神，又重新像花一樣地放了開來。

「唯理哲學」的最初階段，道院的苦行及學術性的冥想，仍然繼續存在。這些是從中古宗教時期接受過來的。不過就一般而論，理智自由精神已經產生了許多敵對的思想派別，而其中有幾派，曾經較爲徹底地脫離了中古勢力的牢籠。唯理已變爲有條理得多，科學化得多；道德教訓也變得更人道些

，更合理些。

十二世紀中，朱熹學說會特別注重對於知識採取唯理主義的態度。這一派口號是：「致知在格物。」主張「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蘊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這種嚴格唯理主義者的精神及方法論，在中國思想裏，就產生了新的唯理主義。可是因爲沒有對於自然本身實驗及處理的傳統和技術，終至於，這種科學的理想，並沒有能夠產生一種自然科學，可是牠的精神，却漸漸在歷史及哲學的研究中，被發覺出來了。過去三百年來，牠曾經在對於古典著作，對於歷史著作的研究方面，產生了一個科學的方法論。牠曾經展開了對於資本的批評，「高級」的批評，以及對於古代著述的哲學態度。那些圖謀推翻傳統註疏的學者們，現在却運取了一個新的工具，這就是一個新的方法論。這樣，他們可以憑藉歷史的證據及演繹的推理法，去掃除一切主觀的解釋，和傳統的權威。固有的唯理主義，現在變成科學性的了。而理智自由的精神，也就得到了一個有力的武器。

我將再敘述兩朝軼事，以結束這個簡略的中國思想史敘述。中國現存最老的哲學家與教員，曾經告訴我一個故事。他早年時候，去見江陰南菁書院的山長黃以周。當他走進山長室時，他看見牆上掛着山長自己用大字濃筆寫着的對聯。那對聯上八個字說：「實事求是，莫作調人。」

數年前，當我瀏覽我父親未刊行的著作時，我尋到七十年前他在上海龍門書院所做的許多卷筆記。每頁頂上都用紅字印着一段格言。其中一部份說：「學生研究任何題目時，都必須首先用懷疑的精神。」

以懷疑態度研究一切；實事求是，不作調人。這就是那些中國思想家的精神，他們會使中國理智自由的火炬，永遠不熄，也就是這個精神，方使中國的思想家們，在這個新世界上，新時代中，還覺得完全的自如與合適。(冷觀譯)

儒道兩家之政教思想

(續)

汪真基

次之，為述道家政教思想。

道家言教，事尚自然；論治國，不以智治。故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見道德經五八與六五兩章）觀此，足徵道家政教思想之特異。雖然，道家思想，乃「正言若反」之辯證知識，如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如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如又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如又曰：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試舉此一校前首，將餘然知其與儒家為殊義同體，卓然同理之又一獨特精神也。是以同為談論六家要旨曰：「天下一數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雜，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司馬氏更中其因歸而殊途之義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隨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太順，采儒墨之善，攝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然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偶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絕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散，形神既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是知道家之政教，在守時變，因物合，天下綱常自明，不肖自分；其要與儒者之析「性近習遠」，及「士君子聖賢」之級選諸說，實顯迥異。

然則道家之政教思想究如何趨？老子曰：「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唯是所教之方，獨在：「為無為」與「學不學」。為無為，即政濟無不為之「至德」；「至德」：學不學，即教期知不知之「上善」；「上德」。所謂「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說正若博約格致之反。覆按莊生，理更豁然。魏光存篇云：「立不教，坐不議，環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耶」。無心形而成，斯有大成若缺，大盈若沖，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大辯若訥，清靜為天下正之義。故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此道家之反言消極而亦即見其積極之政教也。若夫以正言直示積極之政教說，則更有足稱者在。如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懷德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養之云云。說在法自然之大義，其微言精蘊，實超尋常認識。所謂以百姓心為心，為天下渾其心者，乃以時變是守，因物與合，俾天下人皆自明，知不知皆病病也。聖人善因物性，不以形制物，亦不以名亂世，故無與人棄物；舉善以師不善，取不善以齊善，是政之正，教之法。道家立言從教，立教法道，以和善不善，信不信為要，以作焉而不為，百姓皆謂我自然為本。靈太上無為無言，斯下民知有所從；其次立言立教，斯下民得親而名；復次用威施權，斯下民惟畏而避；復其次不法治國，斯下民不從而侮。是以次太上之行，悉有不善之分，不信之言。倘立言有信，則成事歸於不期而然。故曰「以觀其復」。復者乃謂復命於自然之化也。準此一字立教，總道家千言萬語之道德政治與德教真義具在矣。

益有違者，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此其說從主大而化，與所謂學則天下共之之思想。為政與施教，非獨自個人或特殊日益之功，求濟於現果而已。老子所云絕學無憂，其見識在學無不學，而不學其有事之智；故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與其學棄本文末之益，勿爾為安常無事之道之損。靈「道之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樞，樞實也者，得而後成者也」。《莊子大宗師》郭德經注云：無所動心謂之樞，置身於紛紜善惡交爭互傾之地，而心固甯焉，則斃而成矣。實則道德經所云眾人昭昭，如享太平，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之言，與忽兮其若

唯，我今似無所止之義，即趨而面成之的解。趨而面成之目的，在「貴求食於母」。求食於母，即求政教之根本認識，整個理性，以整個根本知識為知識，則可得政教知識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如此不寒不閉而歸於明，斯可神化人生。是即一而一，不一而一之普汎齊物論也。

道家政治，出於廣莫無疆之天自然觀；教化，出於真樸無窮之道德觀。儒者曰：不知為不知，道者則曰：知不知，病不病。此一有極，一無極之見也。從見之不同，遂形社會國家，生命創造之異趣。以有極為教，始見必「行仁政」之要；以無極為化，始見「達道為治國」之母。故道家政治理想，悉自普通自然之理性出發，以達為最高之演繹原則，其達之之方法，則獨自社會政治之消極中，力彰積極平等自由之齊同教化說。彼絕聖棄智，絕仁棄義諸論，雖有似立意過激，然其歸本復觀之旨，則為大聖大智大仁，大勇之至人，真人，神人諸名，是與儒主齊聖之理想同歸矣。蓋道家認「元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如忽此「反」之精式，即絕跡適自然正本之道。且「反者道之動」，無反之直觀，斯無宇宙變化，乾坤簡易之真知。從反以觀復，天運得而人道準。惟是反者必反乎社會民俗之私有，反乎政治鬥爭之利害；若吾人依舊用法理，驟視道家教化，實未免有離情違俗之感。若潛潛觀其治國烹鮮之論，則又確見所謂「大道甚夷」，而害於民之好徑；有國者徒知貨財飲食，服文採，帶利刺，教民趨淫邪，敗失道理，成盜奪之行，而無行道之是也。故治國如農夫之務去草，農夫去草，務在所用之德，一德齊積則無不消亦無不克矣；政之施教之行，務在治自然，治人事。齊治不傷則合於道矣。

或有以道家政教，說在虛無主義者，此固不通之論。老莊所謂「無」，決非「有無」之「無」，而與虛無者之無政府說，尤相逕庭。彼「小國寡民」之治與陶大「玉亦火」之說，既述其政治國家矣，而不爭不伐與夫不以兵強天下之觀念，又烏見其有一無政府主義之是耶？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權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教物，故無棄物。凡此類語，執今之治國者而因之，其誰不曰此政教之極則，達之則可使天下太平耶！惜乎樂殺人者棄君子之器，而為不祥之器；味勝人之力，而不識自勝之強，至國政無所往而不寄，教化起顧目擊之勢，是「有為」悉歸於亂政，「智治」盡滅於繁華，老子曰：道之出口，淡乎無味，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用之不可既。今天下無道無政，失學失教，將安見此「道易知」，「道易行」之政教思想普救天下國家哉。

文化記事

國人哲學論著概觀

近今出版的幾種學術刊物中，頗有幾篇關於中國哲學思想的重要論著。從中頗可見出我們思想界已走上尊理性尚批評的道路。在尊理性方面，如本刊本期所載胡適之先生的「中國思想史綱要」即力言人文主義，合理主義，及自由精神，為古典時期中國哲學的三大智慧遺產，并指示其現代的意義與價值。梁漱溟先生的「理性與宗教」（見思想與文化第二期），亦力言最近為理性時代，而理性與宗教本性相違，所以在全世界的思想界中，一方面為理性轉強，一方面為宗教衰弱。胡梁二氏哲學思想本不盡同，而對於理性所持意見相同，由此已不難察知中國思想界的大勢所趨。在批評方面，如馮友蘭先生的「貞元三書」出版以來，書評即有三十篇之多（見本社即將刊行的「新知言」一書）。陳康先生的「判斷分析」（見國立中央大學「文史哲季刊」創刊號），亦為對於金岳霖先生的判斷論的商榷。鄭斯先生的「康德對於玄學之批評」（見「學術季刊」），雖是闡述康德，實則亦係對於目前哲學界「廣立新論」的活動有所謂。而在上述幾種中，各家關於中西文化交流問題亦均深感興趣。胡先生的論文為對外人而發，其本身自即為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之實施；梁文對於中西文化交流的事實，亦多所敘述。范存忠先生的「十七八世紀英國流行的中國思想」（見文史哲季刊），除敘述事實而外，更指出英國之接受中國思想的背景。湯用彤先生的「文化思想的衝突與調和」（見學術季刊），則更進一步證明「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思想實有他的特性，外來的文化思想必須有所改變，合乎另一文化性質，乃能發生作用」。此與陳寅恪先生一向所持「格義」之說正相符合云。（紀彬）

傅樂煥氏關於宋遼金史之鉅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傅樂煥氏，努力於宋遼金各代史實之研究，已餘十載，成績斐然，見者曷佩。向曾致力新學之金毓勳氏，近特與傅氏結為忘年之交，時向傅氏質疑問難，故金氏近時有所論著，每津津樂道傅氏之名，謂其之功力斷斷俱難及也。唯以抗戰期內印刷困難，傅氏所有著作均未刊行，近方出其「遼代四時捺鉢考」五篇及「宋遼關係表稿」刊布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第二、三兩份中，兩文皆傅氏鉅著，窮源竟委，對契丹之興制風習，宋遼之邦交禮儀，考證極盡詳確。其成稿備極艱此二文而刊布，則其貢獻更將什百倍於今日，謹拭目待之。（宗 牧）

研究工程學應有之認識

邵逸周

沒有印刷術的發明，世界的文化不能達到今日之勝境；沒有紡織，灌溉，建築，交通等工程，人類的衣，食，住，行亦不能進化到現在的地步；沒有大砲，軍艦，飛機，則枝木為弧，刻木為矢，仍是鬥爭的利器；的確，工程是人類進化的要素，也是民族生存的基本。有施其工程能力的國家，就可造國強盛，四方無侮；沒有施其工程能力的國家，則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由此可知工程學的重要。工程學與純粹科學，是相輔而行，可以互為因果的，科學愈發達，工程即愈進步；工程愈進步，科學亦即愈發達。工程學所異於純粹科學者，只在應用。惟「應用」二字，涵義甚廣，純粹科學是格物致知的學問，應用科學是興於格物致知，運用自然，終於人類享受的技術。故研究工程學，尤為強興民族之緊要工作。

「研究的嚴格意義，是窮探原理，揭發奧要。惟普通以性近瀏覽某一類實報，或關心某一類事業，都稱之為研究，實有濫用之嫌。本文根據其嚴格意義，就工程學的一共同性質，提出數點，申論於次，非敢謂為研究前計，僅作開明，聊供參考而已。

(一) 工程學的分類——工程與人類生活的關係，既是包羅萬象，則工程學分類的繁雜，可以想見。目前國內的工程教育，大致分為土木，機械，電機，化工，採冶等學系，各學系又分為若干門，如土木有鐵道，水利，結構，公路，市政，衛生等。機械有造船，航空，機身，汽車，紡織等。電機有電力，電訊，電機製造等。化工有製糖，酸，鹼，酒，焦，革，水泥，油漆，染色等。採冶有煤，油，金屬及選礦等，冶金有鐵鑄，非鐵鑄，冶冶，鑄冶，電冶等。在施其工程的時候，為取分工最高效率起見，每一專門儘可使該科學的發展，分為若干工作項目，例如採冶原為機械製鑄之一，查則甚古，很少有人注意他的學理，自從一九二三年華盛頓的海軍限制條約以後，列強都想在限制噸數以內，造出最有效率的軍艦噸位，於是都從事接岸的研究，以期節省噸位的重量，而不損減材料的強度。不啻唯是，某一種合金，

應根據其銀相構造，選用某一種溫度和手術，都可明白規畫接岸的軍艦火車，早成事實，故接岸在今日已由一簡單的技藝，躍至一種專門學術的地位。類似新起的科目，實不勝舉。總之，工程愈發達，其分類亦愈繁多，換言之，研究的途徑，即愈細密。

(二) 基本科學的準備——大學或專科學校的工程教育是廣義的，研究工作則為狹義的；故受過學校的工程教育，再作研究，自然順理成章。但有相等學力，未嘗不可從事研究，不過在現代工程的演進的過程中，工程學校教育的基礎，一天重要一天。司梯芬孫是十九世紀中最有成就的工程師，他一生所受的學校教育，只有愛丁堡大學的半個學年。因為他的父親不相信學校，而注重用苦功，司梯芬孫素著家教，於離開學校以後，非常懇切的求知，凡關於機械工程的基本科學，如數學，力學，物理等，都細心研讀，所以他後來的成功，有所由來。因此，無論研究什麼工程，先應認識其有連絡的基本科目，但是工程學愈複雜，則與有聯絡的科目亦愈多，在學校以外研讀這些科目亦愈困難。講到一般的基礎的科目，至少有數學，應用力學，物理，化學，工程材料學，經濟學等。各項工程需用數學的程度，固有深淺的不同，但小而計算成本，大而設計圖案，都要需用數學的幫助。不知道應用力學，不但談不到設計，就是普通的構造，也難瞭解。物理化學工程的連絡，更是顯明，不但各項工程實驗過程中的作用，無一不需用物理的解釋，並且運用理化的智識，可以省去許多無意識的實驗。材料關係工程的耐久，強度，與經濟，故工程材料學為必備的知識。經濟學與工程的關係，發展較新，減輕成本固然要有經濟的知識，判別一種工程的投資，是否適合需要，尤須有經濟的知識。從前工程簡單，這種基本知識的範圍比較小，現在工程則極複雜，故聯絡的範圍也愈廣。上述的幾種科目，都是一般工程的入門途徑，至於每一工程特殊的需要，則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三) 理論與實驗的輕重——研究工作有三個可能的途徑：第一，重理論

對於第三次全國美術展覽會感想

蔣復璁

凡參觀過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的人，來看過第三次全國美術展覽會，一定感到這一次遠不如上次的盛大。但這是抗戰時期，情形比較不同一點：——即以地點而論：中央圖書館重慶分館，不是太適宜於展覽藝術作品的建築。且正值這冬季，陽光強，很可以給許多鮮健明快的彩色減少效用。展覽的時期不適當，可是展覽時參觀者總是這樣擁擠，於是使參觀者不能仔細地在美術品之前徘徊品味，以靜底底印證其底底欣賞。

可是，在過主持這次美術展覽會的人們，——我是參加的一份子，本來不應當說的，可說是盡過最大的努力了。可以說：因為在這麼有限的空間，如許數量的作品，盡量在適宜的地方配上適宜的作品，空間極求經濟而效用乃見優越。如以備置來講，的確好於上一次。我想人們假使比較兩次的佈置，必定看出顯著的進步。

看展覽會的人們，當然不是研究美術的人居多數，也許不甚瞭解這其間費去多少的辛勤，勞力。但美術家之熱心，必實於他們自己的工作，集中起來成就這一種偉大的表現，是值得欽佩，讚歎的。抗戰以來美術家的工作環境，尤其是他們以創作的心情境況多不甚好，不必說種種物質方面的限制，如繪畫的彩色塗漆等的難得，他們不惜用去珍貴的顏料來作畫，等於耗去他們的心血，但從徵集的作品數目上看，還是怎麼驚人，遠超過可能展覽的數量。由此可知在現今正有不少的美術家在努力創作：已知名的在繼續努力，未知名的正在努力。我們抗戰的口號是「力量集中」，這一次展覽會，美術家是做到了。你們看，這不正是大規模的美術家結果嗎？這許多的創作發揮了美術家的鉅力，在現代文化建設上實可算是最有貢獻的「力量集中」的表現。

再論品質——我祇能就一時的感想，發表幾點：若干美術家彼此在作風，技巧種種上的相互批評，自然非美術者流的批評深刻或中肯。但非美術者流自有其看法，也自有其批評。無論非美術家或是美術家之批評為獨為抑為褒為貶為稱頌為詆毀，批評自有其獨立性，其批評之有無意義與價值，是另一問題。——比方說：「甲不畫繪畫，甲能批評麼？」或：「你說乙畫的不好，你便畫的比較好麼？」……這些是十八世紀在西洋爭論過的問題。這次對全國美術展覽會若干好好壞壞的批評，但我希望作家們分別批評的獨立性與批評本身的價值純粹是兩碼事。不懂美術如我者，也略略說出一點點意見。

這一次展覽會中有若干件古畫，出自故宮博物院，看過時下的作品的人，再參觀到那些作品，必有「今不如古」之感。但是舉例說：時下的作者不個個皆是趙子昂或文徵明。藝術流傳若干年，作者一代一代的在歷史上經過自然的選擇，其間「名家」湮沒不傳者不知幾何人，餘下的作品，祇少數「大家」

而不實說，第二，重實驗而忽理論，第三，理論與實驗並重。對於第一個可能的途徑，我國教育當局已在糾正，故選來各學校的實習科目，漸趨嚴格，工科學生應在實習工程的地方服務，亦為事實。重實驗本不作實驗，在工程上無異隔靴搔癢。改革煉鋼，若不知煉鋼的工作，不做改革的實驗，如何可以着手？設計機械，若不製模型，實驗動作，如何能夠成功？施實水利工程，有許多因素不是專憑理論所能推測，故水工實驗已公認為水利工程設計的根本，這都證明第一個可能的途徑不是途徑。對於第二三兩個可能的途徑，可以從瓦特James Watt與非狄克Richard Trevithick兩人生平事業的比較，能其優劣。他們兩人都生在同時，都為研究蒸汽機的先進，瓦特專心於低壓機，瓦氏則努力於高壓機。瓦特注意學理，先認識了蒸汽的物理性質，在工作的時候，溫度愈高愈好，在蒸汽的構造，愈冷愈妙。他根據這個學理，設計蒸汽與蒸汽的構造，以收獲益，結果，後世認瓦特為蒸汽機開的鼻祖，工業革命，亦歸功於他。瓦氏不但創製高壓蒸汽機，並且在公元一八零七年，即在司梯芬獲得火車獎金前二十二年，會駛蒸汽火車於倫敦，這可見他創造能力的偉大。不過他偏重實驗，至少在他的傳記裏，未見提到他的理論工作，所以他的高壓機不如瓦特的成功，他的火車亦不如司梯芬的收獲。由此看來，重理論而不試驗，固無成就，憑實驗而不講理論，亦是美中不足。若欲登造極，得成正果，必須兼重理論與實驗方可。不過實驗工作，并非如理想之容易，不但化費時間與金錢，而在工作時尤有邏輯的觀察與歸納，若實驗時先存成見，牽強附會，或不注重準確，草率了事，這不僅為徒勞無益，且自欺欺人，有反科學的精神。

的，爲人所熟知，我們現代存留的這少數「大家」的作品，自然珍若拱璧。以現代的多數作品比較那少數，自然不若比，但並無庸比，這不是現代畫家的責任，畫家可以模寫古人，亦可無庸，現代作品自有現代的特色，屬現代的意義，甚至也可以說非古人所有。「泥古」的眼光既換，「觀今」的心態自平，若干批評便可折衷至當，歸於平恕，於美術創作倒很有積極的助力。

類推：看西洋畫者，不必便是西洋藝術史上的大畫師或畫家，既不必是，也不是，縱我想，更不應是。……推類，於形體，於建築圖案，皆是如此。

很顯明的，這一次的美展，無論是，繪畫，雕塑，工藝美術，圖案設計，多數第二次美展進步，即以西洋的作風論，若手收法西洋畫家之迹，屢歷可尋，派別似乎皆有摹擬，髣髴具體而微。而若干國畫也明明以毛筆代特油畫筆或炭筆，有意無意用西洋的透視法以作山水，人物也隱約可看出是練習過寫生。但無論是屬西畫派或國畫派，漸漸彼此參互，似無可礙。

何以故？凡美術作品，總脫離不了時代的色彩，（近代交通之便利，極遠處的地方色彩便很少），儘可見者，作家獨特的個性，以及這時代的環境所顯示於其心靈而又出於其筆端者。即算作者個人否認，國畫受西畫及西畫家之受國畫影響，竟可以不自知，這不必是有直接的經驗（Experience）而可以是間接的（Indirect）。倘若一位作家在西洋研究繪畫十年二十年，或從小在西洋學，可以有成，甚至於有大成就，但回國再從事自由創作，其回到「中國人的西洋畫」的範圍，也只是時間問題。因爲一切藝術方面精神方面的生活環境皆已改變。

就這種趨向論，豈不是將至於不中不西的結果嗎？中西西畫原來純粹是兩極——我以爲就美術價值論，無礙其品質之高。印度作風影響唐代以及後代種種美術，卽世帶之流紹介西洋作風，於立軸上作聖像，固守舊趨新兩派起初各自保守，後來也相互滲融。這一次美展中有名的西畫家表現了在西畫中體面而在國畫中常有的意境，但依然是佳作，若干寫抗戰情狀的國畫，也不是有所承襲，倒是出自寫實。……種種散在西洋。

各不相入，各畫師承，各各保持其個性又從而發揚光大，我是贊成的；但請容我作這樣一種假定：即是中西種種美術創作，漸漸趨於合流，漸必趨於一個大成的時期。我們吸收西洋美術的種種佳成分，必將漸漸使其化爲我們自己的東西，隱隱可想像將來開出一種新的風格。

再就一般的現象說，所謂時代性現於這整個的美展中者，如果我這種觀察不是太敏感；若干種顏色皆清雅，樸質，抽象地說，我們現代人沒有失却理智，同時也可看出勞苦有一種蒼涼磅礴之力，普遍表現於種種作品上，表現我們現代人不足運用這理智的感憤。美術與國家的運道息息相關，便可說這也是民族復興的一種現象。

我無細細看過這次展覽會全部作品，必定感到在這時期舉辦這一種雖不太龐大然不太局促的展覽會，良非易易，我深深地對展覽會第四次美展更進步的表現！

（四）常識與判斷能力的必要——這兩種才具關係研究的成績，非常重大。解答一個純粹數學問題，只須求方法的正確，而用不着顧到題中的與件是否合理。但研究工程學不然，實驗固須有預定邏輯的步驟與細密，就在採用實驗與件的時候，亦須衡情度理，比較當時實驗的準確程度，而作最後取捨。假設實驗的與件不確，則歸納的結果自無價值。可工程不問大小，需要配稱，體察一個偉大的建築，而加上許多凡俗的裝飾，或在一段荒僻無路的地方，鋪上柏油路面，其本身固無毛病，若以工程眼光批評，都爲不稱。工程的性質，重在利用厚生而忌浮誇天物，還在事實上因應如此，在研究時又何嘗不然？故選擇研究對象，不獨宜求性之最近，尤應考慮價值。此外更須瀏覽各種工程書籍，以廣見聞，否則人家二十年前的玩意兒，我猶以爲新發明，這豈不貽笑大方？總之，研究工程學，須有對於科學的興趣，就是裏滿博自己的見聞，不要重復人家的工作之謂。總之，研究工程學，須有高深統籌全局的能力，方能達到效率，若欲增進這種能力，則必得自具常識與判斷力始。

當然，以上所說的四點，不能包括對於研究工程學應有一切的要求，只是直接聯絡的幾條。吾國際茲復興民族運動之初，建設工程，百端待舉，工廠相繼成立，而技術人材，尤其是中下幹部如監工技工等，都甚缺乏，故提到高深的研究，許多專家常以高調視之。其實技工的缺乏，其致性廠以後，尙須訓練技工，方能開工，（中國第一次第二次五年計劃均有此事實）都爲迎頭趕上之工業國家，應有之過程，並不是怪，若以此而忽視研究的工作，則未免因時廢食。再觀夫瓦特之蒸汽機，司梯芬森之火車頭，貝塞麥之煉鋼，均賴於世界向偉大，吾人更信國家建設，舍研究沒有進步。

怎樣復興我們的書學

祝嘉

(一) 書學在藝術上永遠的地位

我國自來書畫並稱，遠溯往古，書畫同出一源。繪畫在每一個國家裏都有，但是書法也成爲高超的藝術品，是我國獨有的，在別國度裏是找不到的。這一種藝術，在我國社會中，向來雖然都很重視，但他們仍然像國運一樣，有興有衰，到了結果，總有江河日下之勢，甚至有人懷疑他的地位有動搖的危險了。自唐朝以後，用文章來取士，兼及書法，而高超的藝術遂爲干祿的工具，書法雖甚重視，地位仍然崇高，然而其品格却越來越低了。至清朝末年，科舉廢，學校興，書法仍然爲社會所重視，中小學裏雖然尚有書法一科；然不過備數而已，隨便委一教員担任。所以有些在國內中小學畢業以至大學畢業，尙不能寫流利的書，牽強保初學習家的一樣，書法的厄運，尤其於科舉時代，書法這一變而爲少數人的消遺品。隨之反有人懷疑書法的地位有動搖之勢了。自歐洲文化輸入，我國文字，被認爲複雜難學，遂有主張廢漢字而代以羅馬或注音字母等拼音字。這麼一來，遂誤認爲「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書法自無所用了。假使漢字實行代以拼音字母，但是古今書籍，不能一一都把拼音字母翻譯過來，而將舊籍完全焚掉，則漢字雖然廢，而不能盡廢。再退一步說，古今書籍，一律代以拼音字

，然書法在藝術上的地位，仍然能夠存在。試看鐘鼎文字甲骨文，早已不通用，而仍有人臨摹，於考古上，尤佔重要的地位。我國筆硯，誠然不便攜帶，自來水筆代之而興，將來演變，或將成爲專家之事，若繪畫一樣。但是能繪畫的人很少，繪畫仍然不廢，仍然很有地位；在這個西畫盛行之日，國畫地位，仍然未曾動搖。或者因爲精研的屬於專家之故，反可以發揮其天才，達到高深的境界。況且書畫既同同源，國畫家都公認學國畫的人，非精研書法不可；以畫也是積畫而成，書未佳，則畫也無從而好，所以有學畫必先學書之說。這樣則書法之興廢，又將與國畫同其運命，國畫之提倡，大有人在，書法何爲而獨廢呢？

書法精微，其佳者，每至「曲高和寡」，不是專家不能鑒別；但是掛於壁上，玩之既久，就是毫沒有研究的人，也漸覺其妙。其感人之深且遠，不及繪畫，但其應用甚廣，自粗識文字以上，幾爲日常所必需，又非繪畫所能及。書法感人，也不及音樂之深且遠，但要甯靜的修養，則書法爲長，這就是老子所說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馳騁田獵，令人發狂」，也不能說是毫無理由的。繪畫音樂，也足以表現其個性，詩書的陶養，尙尙的簡操，俱能表現出來。然畫尙有取於外物的形與神，音樂尙有一刹那間的表现，不能久留。書法則

純粹表現其個性，品學的高低，性格的剛柔，甚至一時一地的環境，也表現紙上。蔡邕筆論說：「書者，散也；欲先散懷抱，任意恣情，然後書之，一可見其個性的表現很強。古人且有以判人的窮通壽夭雖未免有些過於誇張之處，但是說他是毫無理由，則懸也不敢苟同。

我尙記得民國二十五年，我在南京，偶入日文書店，見日本所印行的書學刊物甚多；但在我國尙未見有這種專刊，甚至在各種刊物上要找到一篇關於書法的文章，也不容易。況且日人到處有書學會，其研究的精神與愛好的普遍，真足使我們慚愧；我設若果再放任下去，幾十年後，欲研究書法的，也要到日本去留學了。我們豈可任他沈淪下去，讓他到日本去發展嗎？

(二) 書學衰落的原因

「物極必反」，無論那一種東西，發展到了最高峯，則非漸漸地衰退下去不可！不但我國許多事情是這樣，就像希臘古代的雕刻，到了今天，仍然爲世界藝術家所寶貴；雖然近代歐洲的進化很快，再也沒有超過這一種的雕刻物。我國的書法，也是一樣。大家，以南周爲最高古，以後就再沒有超過商周的大篆。到了秦代，就盛行一種小篆，李斯的作品，是其代表，以後也再沒有超過李斯的小篆

到了漢代，隸書盛行，存到現在的隸刻，至少也有百數十種，以後也再沒有超過漢代的隸書。到了六朝，就是楷書盛行的時代，楷書到此，也已登堂造極，所以唐朝以後，就漸漸衰退，這是我國書法勞所衰微的衰退。因為事已到了極，則不能再進，後人但求去學他的，學他的當然不認及他，這是衰退的最大原因。楷書以六朝為最高，假使後人一律去學六朝，尚不至於江河日下。但是事勢不然，唐人學六朝人書，宋人又去學唐人書，元明人又去學宋人書，清人又去學明人書，甚至學當代人之書。米

芾論書評說：「宋宣獻公毅作參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韓忠獻公琦好類書，士俗皆學類；及蔡襄，士庶又皆學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學其體，自此古法不講！」在宋朝的時候，米氏會變通過一段的儻款，這等毛病，後代情有加甚，不獨例外。其次就是科舉時代，兼以書取士，書邊有一定的式樣，力求工整，就是所謂黑方光。墨寫得濃些，色澤自然好看；方正自然整齊，橫看縱看，都成直線；光是娟秀，就是幼穉些都不妨，沒有違背了這個條件，就合格了。工整雖然不能說是壞，且初學必從工整入手；但是一定要工整，就會把天才埋沒。因為要干祿，求官運的亨通，則不得不趨時，像上面米氏的儻款，安能談到自由發展呢？以高超的藝術品，而用來做升官發財的工具，當然是會退化的。

自科舉廢後，書法本來是可以自由發展的。但是在清朝末年，國貨且弱，非研究科學，無以圖存，一般人遂以為此乃不急之務，沒有餘暇去研究他。況且筆硯攜帶不便，自來水筆起而代之，毛筆之應用便少，書學也遂少有人去過問，反不及科舉

時代的干祿之尙有法度可觀了。因此之故，教師缺乏，在小學中，雖然尚有習字一課，也沒有方法使兒童養成書法的基礎。拙著書學（二十四年正中書局出版）及愚意書話（二十六年出版南京孝文書局發行）曾為書學作將伯之呼，但是仍未見能引起教育當局之注意。去年（三十年）又寫成一部書學史，約二十萬字，也不過是為書學呼籲，但不知出版何日。最近見報載上海市書學會的組織，且定三月三日為書人節的話，但未見下文，未知進行如何。恐將成爲曇花一現吧！

（三）復興書學的計劃

以今日而論，書法的衰頹，為自有書法以來所未有。若聽其自然，讓少數人去研究，則可以維持其如樓之不絕，未足以談復興，所以必有待於教育當局和社會人士之提倡。我以為第一步要設立書法學校，或於大學師範學校裏設書法專科，認真研究書法，以培養書法教師人才。再令全國中小學校，切實研究書法，以建立青年的書法基礎。另廣設書學會，（像日本的書學會各小城市也設分會）再刊行書學期刊以指導初學，以資宣傳，使其普遍。這一個簡單的計劃，並不是難以做到的，只要有力量者一舉手一投足之勞，就可以了。若能將上面幾項計劃進行，我相信十年之間，就可以做到人人能書。（文盲當然除外）這不是我有意誇大其辭的，因為我國沒有不愛好書法的讀書人。現在再把我的方法，分做兩項，敘述如下：

1. 學書的捷徑

我以為學書並不是有什麼秘訣，很深的學理，不容易研究。講到方法的應用上，也是很簡單的，

總括不過三項：第一是執筆，第二是運筆，第三是陣陣。

執筆是基本問題，執筆一誤，就最容易勞而無功，學書不容易進步，其最大原因，就在這裏。因為普通執筆，筆放在指的關節，不用指尖，所以不容易用力，違背了包世臣藝舟雙楫的「五指齊力」的方法，也就是違背了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的「四指爭力」的方法，況且手放在桌子上，其筆鋒當然會向西南，（用地圖上來的方位說）不論橫畫直畫，下筆都是順勢，筆鋒在邊，畫就不能得勁，所以容易勞而無功，這等毛病，最為普遍。寫字半寸以上，就應當懸肘，（腕和肘都懸空中）就容易運用中鋒；最好是大小字一律懸肘，懸肘三個月，就可以做到，並非難事。不過小字懸肘很容易疲勞，但既放手於桌子上，則必留意筆鋒不偏向西南，以免陷於順勢。（拙著書學執筆一章，論之甚詳，口附有執筆圖。）

其次是運筆，就是筆在紙上往來向背轉折收縮的方法，也很重要。古人一筆三折，常取逆勢，最忌直來直往，直滑過去。所以下筆的時候，欲作橫畫，本是應向右行，但是必先使筆向左行，然後再折而向右行，行到盡處，又收向左，這就是一無往不收」的方法。直畫本應向下行，但是必先使筆向上行，然後折而向下行，行到盡處，又縮向上，這就是一無垂不縮」的方法。關於運筆，前人用疾澀二字論之最精，疾是快，快從熟而來，（初學仍從慢，漸進於快；不能快時而強要快，其病為忙，也須切戒。）所以古來書家，常以日書萬字於指。澀是滑的反面，面而曲相近，這就是行筆的時候，步停頓，不使他直滑過去，當步能夠有力。練行不

欠，就覺筆鋒好像劍鋒，紙面粗澀，那就漸漸達到目的了。（這一層拙著書學，繪圖說明，頗能詳盡。）但是步步停頓，不一定是遲慢，不過初步這樣練習，習之既久，到了成熟以後，就是行筆如飛，也能步步停頓，旁觀人，固不能見，就是自己也不覺得了，自然前然而，就有停頓，就能夠灑了。不過快以後，有時仍要參以博，使其生姿，到了那個程度，自然明白了。

其次是臨碑，求學必先擇老師，以楷書說，楷書以六朝為佳，原拓很容易得。六朝碑都是青丹於石，就丹刻之，不若開帖之歷經潤刻的所可比擬，蓋誌之新出土的，尤為清整銳利，不必取唐代歐虞柳顏各家的翻刻。（唐代名家書翻刻的很多，名碑如顏的郭家廟碑柳的女秘塔尤甚。）況且唐代書家從六朝來，何必取法乎中，甘居卑下呢？廣為舟楫說得好：「六朝筆法，所以過繼後世者，結體之密，用筆之厚，最宜顯著；而其筆筆意勢舒長，極極小字，嚴整之中，無不縱筆勢之宏往，自唐以後，為促促急，若有不可移日之勢，此古今人之不同及也。約而論之，自唐為界，唐以前之書密，唐以後之書疏；唐以前之書茂，唐以後之書潤；唐以前之書舒，唐以後之書迫；唐以前之書厚，唐以後之書薄；唐以前之書和，唐以後之書爭；唐以前之書實，唐以後之書消；唐以前之書曲，唐以後之書直；唐以前之書縱，唐以後之書欹。」試看郭石如魏碑家學六朝碑，其成就超過宋元明各代書家，可以證明。學碑應當取六朝，已無問題。但是六朝書有方筆有圓筆，宜先學方筆，因為方筆用頓，容易使腕力指力強；圓筆用提，初學不易用力。（拙著書學於學碑次序，論之頗詳。）楷書而師六朝，再進一步去學劉宋隸，加以欣賞性，欲與唐朝名家爭地位，是有可說的。

還有一層就是凡事要求大大進步，必須經過大才改革，學書也是一樣。隨一碑久了，不見得進步，最好是找一種碑書體和現在自己的書體相近的，或至相反的，去改革他。因為學一種碑，最容易得一種毛病，須急覺醫治，免其病深，所以越早越

好。常常有人問我說：「像我這樣的書，近那一體，請你介紹一種碑給我學習。」這是最錯誤的。若以前沒有用功夫，當然不能和那一種碑相近，就偶有相似，也是耳濡目染，而得其皮毛的毛病，去之惟恐不早，安敢以為有可恃；有志學書而誤於此的人也不少。

捷徑速成，自有大道；最怕是趨炎附勢，偏鋒取巧，得其形似，（用偏鋒學書，最容易得其形似）就自以為得意，走入這一條迷途，必至勞而無功，終身沒有希望了。李治敬齋古今黃說：「予初學東坡先生字：間有教予以以筆取媚者，當時不悟，謂彼公心畫之妙，盡於是矣。今而老大，轉覺字畫醜態不成，雖折指拗腕，力自改悔，竟莫能奪去舊習，且學小技，一言之誤，為累終身。況心術之微，運動無方，易放難收，後生輩得不登堂大人君子之門，以端本而證其源耶？」這是很好的證明。我常說，學書學其皮毛，則越趨越俗，越趨越沒有方法醫治。所以有好多次寫字的人，用了半生功夫，絲毫沒有成就，這是犯了孔子的「學而不思」的毛病，於執筆運筆時，必然有一項，或至完全錯誤了。小小的錯誤，致陷於大大的失敗，是很可惜的。

做到人人能書的企望

書，無疑地每一個人都可以寫得好，但須注意執筆運筆臨碑三項，快的一年半年，慢的二年三年，就可以寫得很可觀的書。（熟而不俗，雅而有門庭。）許多人對於書是放棄的，持放任的態度，所以終身不能夠寫好書，這是有好多資的惡魔阻隔在那裏，使他們望而却步。第一是筆性說的誤人，（拙著書學和墨畫書話皆力闡筆性說）筆性稍鈍，遂自以為限於天分，甘於拙劣，有志之士，也為之喪氣。不錯，無論那一種學問和藝術，都有關於天才，實法也不過例外，但是天才不是筆性所能代表的。我沉痛於此，二十餘年，很知道筆性鈍拙，半為執筆的錯誤，或因手不穩捷所致，（手不穩捷的做大字尤易推體。）但是執筆運筆的方法一變，則筆性

也常常隨之而變；執筆一誤，則下筆無從而合法，下筆既誤，則終身不能有成。況且筆性好的，不過筆筆秀媚，不善利用，很容易入於通滑之途，終身不能自拔，毫不足恃的。淺學的我，於古人著作中，尚未找到「筆性」二字，這說起於何時，未能證明。我以為為學書的天才，實為「解書」，此說出於王羲之，解，就是了解的意思，有解別的天才，也就有了學習的天才，所以說解別，就是天才的表現，蘇東坡詩說：「我雖不善書，解書莫如我。」虞翻舟雙料也說：「吾腹有神，而吾腕有鬼。」這就足以證明天才是在於見識，而不在於手了。

還有些說女子腕弱，不容易寫得好字，這個也不對。執筆是貴指力齊，五指得力，並不用很大的力，何以說女子不容易寫得好字呢？況且男子也有腕弱的。所以我說學書不論老幼，不分男女，一天臨寫半小時，一二年功夫就可以寫得很好的字。（我是實踐過的）不要為墨池筆塚所誤！（要初古名家爭勝，當然要墨池筆塚）所以我以為可以寫到人人都寫得好書。先說小學生從初級到高級六七年裏，能指導得法，就已經寫得很好的字了，不待到中學時代，再去用功。一天寫半小時字，不論怎樣忙的人，大概都可以抽出時間來的。常見一般學問很好的人，書法也不好。學問是那麼難的事，他們都可以做到，這等治學精神，是無事不可成功的。難道很容易的書法，反無法求精呢？若說他們真忙，他們不是終日執筆的人嗎？所以好學的人，尤其是容易成功。花一個鐘頭去留意執筆運筆臨碑就行了。把這三項方法普遍宣傳去，十年之間，做到人人能書，是可能的。

我原想選集同志，印行一書學期刊，對於書法做詳細的說明，對於六朝以至秦漢三代文字，做詳細的介紹，使有志學書者，有捷徑可從。但是國難方殷，強寇未滅；而我又流離播遷，萍蓬萬里，差免饑寒，一時無力謀此。但是建國的方法多端，藝術已被社會重視，書法必不至於摒棄。所望有力者未雨綢繆，使抗戰勝利後，書法也像春草之蓬勃，與其他藝術同時發展，這是作者的希望。

國書
評介

幾種中國外交史的史籍

文秀瑞

去年我因生活舒適，在一個風景優美古城租了一間小房，明窗淨几得良師益友的引導，漸漸的對於中國外交史發生了興趣。惜為生活所逼，只一年就離去，一年的工夫當然談不上經驗與成就，不過心中時常惦念這齣雜劇，於今又不易找到，因此總想得一二位同道時時給我便利，這實在是我這這篇東西的目的。

中國外交史的研究被我國學術界所重視，只近幾年的事，這當然要歸功於蔣廷黻先生的提倡。一個國民應該知道自己國家的過去和現在所處的地位，要知道別人在怎樣對我們，然後我們才有所應付。凡我國民都應念國家在國際社會的維持，不是一件可再便宜的事。今日已決不容許我們再犯以前的種種錯誤了。因為如此，所謂我發覺現代國民都應當熱讀外交史。

外交史雖然是外交史，但仍然是歷史，它的研究方法和其他的歷史研究方法一樣的。不過有點不同就是它的起點較遲，這是因為我們國家參加國際社會較晚的原故，所以一般人都以為戰事前後作起點。再有一點就是外交是國家與國家間的關係，所以必須要知道各國的文件，才能明瞭一件事物的真象。因此研究中國外交史決不能忽略外國的史籍，若能精通每一個國家的文字，那就再好沒有了。研究歷史必須要注意史料，研究中國外交史也是如此。史料有官書檔及私人集子等。現在舉出幾種重要的史料給初學的人介紹。

我們中國關於外交史料是相當的完備。最主要的有兩部，都是按年月日編的。一部是故宮博物院出版的三朝籌辦夷務始末，這部書自道光十六年起至同治三十年為止，是以年月日為序，每卷以三十五頁為準，沒有索引，也沒有節目，上諭的月日是以發出的月日為準。奏帖的月日則以聖諭的月日為準，照例則沒有月日。咸豐朝那一部分貢獻最大。因為當時辦理對外交涉的人物，如徐廣縉，葉名琛，何桂清，桂良，花沙納，恭親王，文祥，顧爾等，除徐一人外餘都沒有私集，自此書出版後，當時他們所經辦的交涉詳情，遂大白於世。國治朝的卷數是最多了，但因會國藩，李鴻章，郭嵩澂等人都早有私集發表，故其中只有關於總理衙門的外交文件的貢獻最大。第二部是王亮王彥威（號夫）所輯的清季外交史料，是銜接前一部分的，光緒元年至三十年四月是軍機處檔案，三十年五月至三十四年是補編，宣統朝材料的來源多為外務部檔案駐外使館的存稿。其中關於歷來不得解決的李鴻章使俄與寰世凱交涉也是沒有很完整的文件。此外故宮博物院出版的嘉慶清代外交史料，光緒朝清代外交史料，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都是極珍貴的東西。

外國檔案和我國有關的甚多，惜不易獲得，茲舉其要者言之，英國的 Parliamentary Papers，普通稱作 Blue Books，為英政府所印行的官書，提出國會為議員作參考的。但亦定價發行，彷彿政府的公

生活指導

公務員的五常

阮毅成

本人嘗以為凡公務員服務必須具備「五常」，判斷須本諸「常理」，待人須本乎「常情」，接物須保持「常態」，修身立品須注意「常規」，是謂公務員之五常。孔子為一大學問家，亦為一標準公務員，今就其所論，引證而伸述之。

一曰常態。今世好言專家政治，而我國曾向在常態政治之時代。公務員為人民中之優秀份子，尤其各位經考試及格，出諸正途，尤應為一般公務員之表率。而各位一入公門，縣區鄉保，衣食住行，管教養衛，生老病死，各項工作紛至沓來，各種問題目不暇給。苟非常態豐富，必不能勝任。常態如何方可豐富？其一為多學。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種好學精神，足為我輩效法，或以為從政重經驗，與學無關。論語載，子路任子羔為費宰，子曰：「脫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足見夫子對多學之重視。多學之後，必須能消化，否則生吞活剝，徒成穿迂，與致用仍無關也。其二為多聞。多聞能分析，辨其是非，明其曲直。其三為多見。多見能觀察，探其因果，悉其真偽。子張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今人好道聽途說，斷章取義；未聞內容，擅發議論，均非正道。其四曰多思。夫子曰：「君子

報。其中關係中國問題者自一八〇七年即嘉慶十二年以迄現今共計不下七百件，有商業報告外交公文軍事紀錄各種通信等項詳列。另有 Confidential Prints，現亦公開，極可參考，與此相似的有法國外務部出版的 Liore Jaunes (French Yellow Books) 美國外務部出版的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上次世界大戰後，發生一戰爭責任問題，當時分成三派一派以戰責歸三國同盟，一派則以歸三國協商，一派持持緩平。以三國同盟應負戰爭責任代表著作爲 D. E. Schmidt, The Coming of War of 1914, 德國的著作家則多認三國協商，S. B. Fay, The Origin of War 1914-1918, 則持論比較公平。德國爲表白自己對戰爭不負責任的故，於是將以往外交檔案全部刊出名爲 Die Grosse Politik Der Kaiserliche Kabinette 1871-1914, 一共四十卷，以Caesar 爲準編載。有關於中國之部分有膠州灣庚子之役鐵路之爭辛亥革命等，完全出自史家態度，極爲珍貴。法國因之亦刊出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1871-1914, 英國亦刊出 British Official Documents on The Origin of The War 均以年月日爲主，英國所刊者不僅時期只係從一八九八年起而且內容亦不知德法之詳備，它只載前此未曾發行之 Correspondence, 故不如前刊價值之大。蘇聯將帝俄推測後欲盡揭其好，因亦將以前檔案公開稱爲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Red Archives), 編法亦以成案爲主，但缺乏精確組織，其中關於中國外交及日俄戰爭均極詳細由四下餘冊中斷，我國報章間亦有翻譯者。

關於私人集子外方亦有 With Memoire, H. n. v. h. Secret Memoire, Gerard. Ma Mission En Chine, Denmark, China & Her People, Foster, Diplomatic Memoires, 我國方面有林則徐的英文忠公政書，夏燮的中西紀事，曾國藩的求滿日記，曾紀澤的曾惠敏公遺集，張之洞的張文正公全集，鄧承修的話水閣奏議，裕謙的裕靜節公集，張佩倫的滄子集奏議，李鴻章的李文忠公全集，翁同龢的翁文恭日記，薛福成的庸宜筆記，關天培的籌海初集，魏默深的海國圖志，岑毓英的岑襄勤公奏稿，文祥的文文忠公年譜，劉長祐的劉武慎公遺書，郭嵩燾的養知齋文集，劉坤一的劉忠誠公奏疏，馮建忠的適可齋紀行，劉銘傳的劉壯廬公奏議，左宗棠的左文襄公奏議，唐景崧的唐毅齋日記，張樹聲的張靖遠公奏議，王之春使俄草，曾國荃的曾忠襄公全書。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可惜我現在很難得到。

至於中外有關的史籍很好的不多見，茲舉幾本權威之作介紹。英國 Auber (pert), China: An Outline of Its Government, Laws & Policy, 和 Mi chie (Alexander), Englishman In China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美國 Morse (Hosea Boll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1834-1911. Latorre (Kenneth S.),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 S. & China 1784-1844. Dennett (Tyler),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法國 Cordier (Henri), L'expedition De Chine De 1857-1858. L. expedition De Chine De 1860-1862. Histoire L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2. 都是不可多得者，日人矢野仁一以專攻中國近代史著名但成見甚深每多妄造，著有近代支那外交史日清戰後支那外交史(後者武大陶振聲先生在世界各政治最近一期著有書評)只可作參考，但不能篤信。

以上所舉雖是治中國外交史不可不看的，但這絕不能要求初學的人。若對此道有興趣可把蔣廷黻先生的近代中國外交史參考資料對照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一讀，乃是入門之基。

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多思須能明決，否則再思三思，猶疑不決，或時時更張，事事動搖，仍降夫子五思之道也。

二曰常理 每一問題之處理，須本諸常理爲之，論語載：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換言之，即不自以爲是，不先入爲主，不抱有成見，今人每好聽他人不負責任之傳說，而不本諸常理以斷定此項傳說之真偽。又好以個人輾轉傳誤之聞言片語爲真相，而不屑自行分析與觀察，更好於真相未明白以前枉登議論甚至枉費筆墨，經加批評復輕加結論，及至真相既明，漸悔不及。此皆不知以常理爲辦事之本，事事爲人所笑。論語載夫子誅少正卯，曰：「人有五惡，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危而險，二曰行羣而擊，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說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如此五者：有一於人，不得免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無有之。」此即反乎常理以處事者也。

三曰常情 常情者，不矯揉，不做作，尤要者，不患人之不知，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又曰：「不患人之不知，而患不知人也。」不患人之不知已，患其不能也。」又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問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今人好標榜，重表面，尙宣傳，人人知求聞而不知求達，因而妒嫉，磨擦，排擠，均因此生，對於人之憂樂，應易地以相處。對於人之過失，亦當本夫子

精十力語要卷二

張德鈞

實國熱十力著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一日出版

平裝一册八七頁定價國幣五圓

本書著者先有十力語要卷一，一名十力論學語輯略。係選錄王申迄發西閩筆札之精華者而成。民國二十四年冬在燕京出版。寇亂以來，其書已無從尋獲。此卷係丙子至庚辰間筆札之一部分。其餘部分以已卯在嘉州遭寇焚燬。此部賴門人錄副得存。因從事者請求，乃輯為十力語要卷二印行。其意本在「母令則失」，故不會多印，（僅五百本）又未委著名書坊經營。以故流布極希，閱者當亦不衆。然至言不止於傳耳，著家固不以得世俗共知爲榮也。

本書以條結集筆札語錄而成，故形式方面，不有組織，但以時間先後爲次。然若仔細研讀，則語語歸源，字字落實，亦宛然見得有關中心思想在。如本體論，人生論，認識論等，凡所涉筆，莫不有一貫之主張，精卓之觀察，上契聖心而下匡百俗。雖非一觀著作，表面看去似有網紀條理；較其內容，則不過一片閒言語者，所可同日而語也。然著者半生精力實萃於新唯識論一書。此不過平日應機說法之餘餘而已。惟在切學，若無收攝凝集之定力，驟觀新論，眩于宏綱巨構，難免不墜派迷源，失所據。此書則篇幅短小，各爲短說，文復亦亦流便，清高和雅，在在引人入勝。較爲易讀。故雖非爲初機而作，而爲中土思想起信之方便，則實可莫階。

語其玄極，固始首窮年亦難盡其滋味也。

全書共包文二十九篇，又附跋三首，跋文一首，張東蓀答函兩篇。著者之爲學，純由反觀默識而入。自謂「迂陋之學，始於思考，終歸體認，乃其本則在一心之觀，非爲見聞和解而學。易之觀曰：觀我生。自悲，而亦悲羣生之昏冥也。將求得其理爲依歸焉。始固多方，博稽之天地萬物；久之豁然確信此理不待外求，反諸己而得矣。」（八六面）其所存如此。故每談一理，每談一義，莫不從胸坎中自然流出。直義單微，不積支蔓。而復親切有味，耐人尋繹。爲三百年來學者所罕觀。至其爲說最精微，而爲中心思想之所在者，則概見於答意大利人馬格尼尼一書。文長一萬六千餘言。真乃上窮無極，下盡物曲。顯揚中國文化之精神，至矣盡矣。茲錄兩段于此，以見一斑。

中國哲學有一特別精神，即其爲學也，根本注重體認的方法。體認者，能覺入所覺，渾然一體而不可分，所謂內外物我一異種種差別相，都不可得。唯其如此，故在中國哲學中，無有像西洋形而上學，以宇宙實體，當作外界存在的物事，而推窮之者。西洋哲學之方法，猶是析物的方法。如所謂一元二元多元等論，則是數量的分析。唯心唯物與非心非物等論，則是性質的分析。此外析求其關係，則有若機械論等等。要之都把真理（即謂宇宙實體）當作外界存在的物事，憑着自己的知識去推窮他，所

忠恕之道一以貫之之精神，多加體諒。若專據人之短，甚至不惜虛構人之短，而藉以表自己之長，自爲夫子所不取。

四曰常態 論語載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子曰：「切切惻惻怡怡如也。朋友切切惻惻，兄弟怡怡。」又載夫子態度爲「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夫子又曰：「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又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又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足見君子容貌，顏色，辭氣，皆一循乎自然。不矯作，不任意，不反情，不泥禮，不徇動，不照時喜怒變其常態。更不以常態之不能保持而影響工作，以致是非曲直，均加動置。公務員以親民爲主，工作之難有效果，不能盡動，往往因平時不能保持常態所致，須多多注意。

五曰常德 大將之五德曰智、仁、勇、信、嚴，公務員之五德應爲果、達、慈、恆、專。論語載：季康子問：「賜可使從政也歟？」「賜也，於從政乎何有？」「求，可使從政也歟？」「求也，於從政乎何有？」「果者，能任事。達者，能明事。慈者，能治事。皆公務員必備之要件。其次曰直。論語載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子曰：「無倦。」夫子論人不倦之精神，即「有恆爲成功之本」之真諦。故見異思遷，或作或輟，爲公務員所切忌。又其次曰專。子曰：「政乎異端，斯害也已。」又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爲之註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人於其本身工作範圍以內之事，恒之不問，而於他人之事輒好與聞。如組織一委員會，不使其名列於內，即現俾

以把真理看作為有數量性質關係等可析。實則真理本不是有方所有形體的物事，如何可以數算等等去猜度。須知其理非它，即是吾人所以生之理，亦即是宇宙所以形成之理。故就真理言，吾人生命與大自然（即宇宙）是互相融入，而不說分開。因為此真理之顯現故。但真理顯現為萬象而不可執定萬象，以為真理即如其所顯現之物事。真理顯現非超越萬象之外而別有物，但真理自身並不即是萬象。真理畢竟無方所無形體，所以不能用知識去推度，不能將真理當作外在的物事看。哲學家如欲實證真理，只有返諸自家固有的明覺，（亦名為智。）即此明覺之自明自了，渾然內外如一，而無能所可分時，方是真理實現在前，方名實證。前所謂明覺者，即是此意。由明覺而得真理，所以沒有折別數量性質等事。由此，而中國哲人即於萬象而一一皆見為真理顯現。易言之即於萬象而見為渾全。所以有天地萬物一體的境界，而無以物累心之患，無向外追求之苦。（二二二）

又曰：
自來中國哲人，皆務心而輕著述。蓋以為哲學者，所以窮造化而究其原，通衆理而會其極。然必實證之身心踐履之間，體驗之幽微隱微之地。此理昭著，近則胸臆一念，遠則彌綸六合。唯在已有收穫保聚之功效也。如其役心於述作之事，則恐辨說騰而大道喪，文采多而實德寡。須知哲學所究者為真理，而真理必須躬行實踐而始顯。非可以真理為心外之物，而待吾人之知解以知之也。實言之，吾人必須有內

心的修養，直至明覺渾然，即是真理呈顯。如此方見得明覺與真理非二。中國哲學之所昭示者唯此。然此等學術之傳授，僅在精神感應之際，而文字記述，蓋其末也。夫科學所研究者，為客觀的事理，易言之，即為事物互相關係間之法則。故科學是知識的學問。而哲學所研究者，則為一切事物之根本原理，易言之，即吾人所以生之理，與宇宙所以形成之理。夫吾人所以生之理，與宇宙所以形成之理，本非有二，故此理非客觀的，非外在的。如欲窮究此理之實際，自非有內心的涵養工夫不可。唯內心的涵養工夫深練之候，方得此理透徹，而達於自明自了自證之境地。前所謂體認者即此。故哲學不是知識的學問，而是自明自覺的一種學問。（二二四）

此辨析科學與哲學，其對象，其領域，其方法，皆不相同，而中國哲學與西洋哲學，在方法方面與得方面，宜有根本之差異，皆蓋人之所未發，非窮神知化者，未足與語此。著者其餘著述亦發揮是意。意在為中國思想造成一個中心思想耳。故書中又云：「吾今所望於國人者無他，凡講習吾國有學說思想者，亦發揚精華，並勤治外學，博采新知，更致力踐履，求思想與行為之一貫。陽明所謂知行合一之是也。以此養成一種學風，而吾學術始有獨立發皇之希望。至研窮西洋學術者，宜各自由研究，力求精到，但於本國學問，如六經諸子等，若有致力之暇，自當隨分參禪，否則亦無妄言輕語。今後學術界如有此氣象，當無絕學之憂。民族雖危，終當奮起而以自救者，拯全人類。」（四四四）一片苦心婆心，隨處躍然紙上。讀者必取其苦澀沈反復

條之色。果使列名其中，又百毀自高聲價。故作不與聞之狀。乃既不稍分他人之勞，又不稍盡應酬之責。而從旁多所批評，事後多所議論，此種既不思謀其政，而又強欲在其位者，為夫子所深惡，亦後世所切忌，「一」字之重要意義在此。綜上五常，為各位進德修業之途徑。考試及格人員之所以異於一般公務員者，在其本諸公平之選擇而來，各人本諸自己之努力，經過考試之競爭，程度整齊，精神齊一。若再能充實常識，講求管理，運用常情，保持常態，發揚常德，必可成為公務員中之驍勁力，而夫子有知，亦必笑謂孺子可教也。願共勉之。

，新派之久，而後始信其理應之廣，意味之深，願之無盡，而漸漸與之接近，相應不二。乃知其教語所云：「嗚呼，區區文字，皆吾心也。」洵如聖者，真實語者。

我國自五四運動後，國人羣趨西化，見有幾種先學術思想者，動斥之曰封建殘餘，於是新進後生，自嘆嗚呼，精神方面，即已成爲西方文化之拜禮之奴隸。種族未亡，而民族先斷，吁可痛也。至近日，寇患日深，民族之危機愈劇。一時士夫，始恍然于本質之不可損，固有文化價值固未嘗亡。乃又有建設本位文化之呼籲。然孰者爲我國文化之特質，孰者亟須予以昂揚，孰者可以教俗學之散膏，大率尙未之思。上焉者，不過持古書一二名句，與西方學術度傳而已。下焉者，則仍著于瑣屑之考據，無關宏旨，而前者則同檢討過去也。後者則曰整理國故也。如是會足以發揚固有文化耶？針對西洋思想以立言，而完成東方哲學的骨幹與形貌，一，要必讀熊氏之書，始可免「國無人焉」之憾也。